



〔苏〕C. M. 梅尼希科夫 等主编 张 础 等译

当代国际经济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国际经济关系

[苏]C.M.梅尼希科夫等 主编

张 础等译

王德一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7

Стани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
Эрик Пантелеймонович Плетнев,
Вале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Щетинин и др.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85

根据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当代国际经济关系

[苏] С.М.梅尼希科夫等 主编 张础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建外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18.25印张 409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ISBN7-80050-004-7/F·2 定价: 3.85元

统一书号: 4419·009

译者的话

《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一书是苏联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专著，它是1957年苏联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写的《国际经济关系》教学参考书的第四个版本。该书考虑了最近几十年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新东西，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新事物和极为重要的现象。书中系统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际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改造问题。该书作者均为苏联著名的学者。可以认为，这本书反映了苏联学术界对当代国际经济关系重大理论问题的一整套系统观点。

为了加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研究，对当代国外政治经济理论和实际的比较研究，我们翻译出版了苏联的这本专著，供有关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同志有：张础（前言、序、第一、十六章）、刘清鉴（第二章）、惠周怀（第三章）、林中仁（第四、七章）、尤艳琴（第五、六章）、周苏华（第八章）、刘启芸（第九、十、十七章）、马贵友（第十一、十二章）、乔木森（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八章）、黄其才（第十九、二十章、结束语）、邢万金（第二十一、二十二章）、张佩贤（第二十三、二十四章）。全书由王德一同志校定。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定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本书有自己的历史，说明“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这句古老格言是有道理的。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即1957年，在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经济学博士、教授H·柳比莫夫（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总领导和主编下，出版了苏联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当时还很年轻的国际经济关系教研室的一本集体著作，它是为开设一门新课即“国际经济关系”而专门预约的^①。

当时之所以需要开设这门课程，是因为必须为对外关系领域的科研和实际培养具有高深专门知识的干部，这些干部要能够解决三位一体的任务：1、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创造性地分析并预测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状况和途径，这种分析和预测要特别考虑到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和加深所出现的重要事实；2、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它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的建设性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外交艺术和科学所带来的世界历史经验；3、制订现实的有助于更有成效地解决苏共、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的国际任务和国民经济任务的实际建议。

上面提到的《国际经济关系》一书在报刊上得到了专家的好评，以后在1964年和1969年^②的再版一直用于培养整个一代国际工作者的教学当中。当然，生活不断地给教科书和

教学参考书增添新的东西，要求修改课程的内容、结构及其教学法。只要将后来出版的每一种版本与前一种版本比较一下，就足以说明这本教程也是这样。此外，各院校（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全苏对外贸易学院、莫斯科大学等），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等）也经常编辑和出版一些与上述课题和科学实践任务有某种关系的著作^③。

虽然研究对象往往是一样的，但这些著作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却不相同。这里所说的既涉及到一般范畴（“世界经济”、“世界市场”、“全世界经济”等等，也涉及到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国际分类、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等等。在准备这个版本时，作者们基本上是以《国际经济关系》教程前三个版本的方法论观点为根据的，当然也考虑到最近几十年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实践所提供的一切新东西，同时也考虑到为对外关系领域培训干部的国际经验。编写本书时遵循这些原则绝不是因为许多作者直接参与过以《国际经济关系》教程前几个版本的写作工作，也不是因为学习过、研究过或在工作过程中使用过这些版本。问题在于究竟该怎样看待已有的经验。教科书的这种理论体系及其结构，不仅能帮助学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较快地和较全面地熟悉当代国际经济问题，而且能推动他们从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实际问题的来龙去脉中探索最好的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在准备《国际经济关系》教科书的新版本时，作者们与所有苏联学者一样，已经知道了苏共二十六大针对理解国际舞台上所出现的新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和过程而作的具体指示^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意义和作用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促使我们邀请更多的（与以前相比）专家参加本书的编写工

作，这些专家都按自己的科学专业或实际工作的性质分别编写相应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

本书分为四篇：“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际经济关系”、“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关系的改造问题”。

编委会和作者意识到，本书的这种结构可能引起某些争论或令人感到不习惯。有些人可能认为，第一篇阐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比较好。这种结构有其优点（作者在本教科书1964年和1969年的两个版本中曾采用过这种结构），但是经验表明，在这几篇的安排上若不严格遵守历史问题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会在方法论和方法上感到费力和困难。

有人认为，应该更广泛地阐述现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问题，同时把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集中到有关的篇章中去更为合适。这种做法也有它的逻辑和自己的一套论据。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未能以应有的方式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经济关系中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以及这些国家在为改善其对外经济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中所产生的政治问题的特点。关于这类国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在我国文献中已有不少论述。因此，在本书的第三篇中专门讨论这些国家，虽然第一篇也以同样的方式涉及到它们。

根据国际经济关系的改造进程，作者考虑了改变世界社会面貌过程的总图景。据此认为，应该着重反映社会主义结构改革的影响。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著名观点，已成为联合国围绕国际经济关系的迫切问题进行谈判和尖锐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没有现实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积极影响，这种斗争的胜利自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也用适当篇幅阐述

了这种观点。同时，不能忽视对垄断方式进行改造的过程，其中包括使用强制方法，这已成为美帝国主义惯用的方法，因为大家知道，在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必然灭亡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在其总危机的情况下，它还具有不小的、远未耗尽的发展潜力。因此，在第一、三、四篇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此外，也注意到当代读者的特点，他们博学，希望独立思考，更不用说依靠十分丰富多彩的图书市场和无限增长的图书馆藏书，有可能比以前更好地满足自己对各种问题的兴趣了。虽然这个版本主要是为教学使用的，但作者对问题的论述并没有局限于站得住脚的（所谓“无争论的”）结论和见解，而是包括了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在介绍对国际生活各种现象有另外一些不同解释和评价的图书和出版物时，也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觉得这种作法更符合当前的宗旨。

这个版本与前几个版本的不同点在于，本书每篇都以批判分析有关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结束，这是对思想斗争的意义在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国际关系中无比增长这一事实所作出的反映。考虑到本书的性质，作者只想指出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最有政治思想意义的观点，而不去追求“时髦”与虚构的新奇。

苏共中央总书记M·C·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国民经济向集约化发展轨道的转变过程中，要设法实现根本转折。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短期内成为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社会劳动生产率要达到世界最高水平”^⑤。这是全体苏联人民所面临的任务，作者力求以自己的著作促使它最迅速的解决。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

经济学博士、教授А·И·别利秋科和经济学博士、教授И·И·法明斯基对手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编委会和作者们在此表示感谢。

①参阅《国际经济关系》，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社，1957年。

②参阅《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学博士、教授Н·Н·柳比莫夫主编），莫斯科，1964年；《国际经济关系》（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经济学博士、教授Н·Н·柳比莫夫主编），莫斯科，1969年。

③参阅《两个世界体系：对立的统一》（Ю·П·普列特尼奥夫主编），莫斯科，1983年；《政治经济学教程》Н·А·察戈洛夫主编），第1和第2卷，莫斯科，1973~1974年，С·М·梅尼希科夫：《当代资本主义—简明政治经济学》，莫斯科，1974年，《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Н·Н·伊诺泽姆夫等主编），两卷本，莫斯科，1975年；И·П·法明斯基：《当代国际贸易》，莫斯科，1980年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关系教研室В·Д·谢季宁主编的于1976~1981年出版的系列教学参考书，《世界经济—斗争与合作的领域》（Н·О·法里佐太主编，莫斯科，1984年。

④参阅《苏共二十六大材料》，莫斯科，1981年，第78—79页。

⑤1985年3月12日《真理报》。

序

研究对象 国际经济关系是超出各国领土范围的特殊的社会生产联系领域^①。同时每种社会形态、每个社会都有其相应的国际经济联系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把社会看成是不断发展的、多方面的和日益复杂的有机体。有根据地区分人们之间、某一人类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共同性——人民、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之间社会生产关系的功劳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研究经济关系的第一种类型，即内部形式。第二种类型则要放在专门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理论中去研究。换言之，国际经济关系理论是在一般政治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是在后者范围内形成的一个特殊的领域。专门的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即人们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的相互关系，也是一般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但是，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越过国界并成为国际经济关系这一事实，就使它具有了特殊性。研究历史上发展着的范畴、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的方法论是有区别的。例如，一般政治经济学理论按生产、分配、交换（包括国际交换）和消费的顺序来研究生产关系的主要范畴。而专门理论即国际经济关系学说则按另一种顺序研究自己的对象。它的顺序是：对外交换和国外市场、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及其分裂为两个并存的世界经济类型、

全世界共产主义经济的前提条件。

市场概念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为满足社会某些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市场与受不同国家购买力制约的市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就很明显。

当谈到社会内部各阶级之间在产品的生产、占有、分配和消费方面的相互关系时使用的“国民经济体系”概念，以及为确定创造和分配物质财富的途径而研究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使用的“国际（世界）经济体系”概念，在含义上同样也有不小的差别。

最后，还要注意到，经济规律的作用在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下也不相同。经济规律在国际领域的作用特点也包括在本书研究的对象之中^②。

全世界的经济关系 运用列宁的体系观点就能科学而准确地确定当代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共同基础，这个基础像轴心一样使参加国的相互关系构成某种统一体，用列宁的话来说，因为存在一定的国家体系^③。

列宁将当代国家关系这个矛盾的、但实际形成的统一体，作为体系在理论上再现出来，是科学思维的一大贡献。在此以前，人类不可逆转地分裂为两个世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也已成为事实，其中前者尚未形成、后者也永远不会形成包罗万象的全世界生产方式。列宁从当时国际关系的特殊等级制中，或按他的表述来说，从当时国际关系的“金字塔”中，看到了各国相互关系的统一体系。一切国家，不论其内部社会制度如何，无一例外地都被“纳入”这个统一体系之中。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谈到地球上17.5亿居民的状况取决于战后瓜分世界的体系时指出：“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12.5亿，…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

的人口，不超过2.5亿。…最后，不到2.5亿的居民，属于战胜国，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瓜分世界的利益…。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描绘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画”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形成的全世界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是这样。

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全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作体系来看待，就要考虑和研究客观和主观因素，因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全世界交往方面具体历史的系统联系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形成、改变和相互转化的。

苏联共产党在其二十四大和二十六次上制订的和平纲领、苏共中央和苏维埃国家为实现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所进行的富有成果的斗争表明，在确定当代全世界国家间交往体系的内容和动力方面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方法。现时代是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在揭示这个时代性质的过程中，现实社会主义国际战略的效能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然而，全世界交往图景的复杂程度和“花俏程度”，同以往世界革命过程的各阶段相比，也增加了许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谈什么统一的相互关系体系吗？

当代生活由于各国的深刻差异、对抗性矛盾和离奇的结合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在这种复杂的现实中，毫不夸大地说，是苏共、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指出了当代国际统一的全世界体系的主要核心问题。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出，人类面临着一系列相互联系着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苏共二十六次指出：“现在，在国际方面，对我们党、我国人民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来说，没有比捍卫和平更为重要的任务

了”⑤。

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两种世界社会制度的斗争空前尖锐。然而，企图用军事对抗的办法来解决制度之间的历史争端，必将使人类遭到灭亡。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保卫地球上的和平问题，无论在今天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直是我们党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坚决贯彻这个方针的出发点是列宁的这样一个经典观点：“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⑥。

在列宁对这些关系的阐述中，定义的顺序就很重要，这指的是：(1)共同关系，即两个对立体系共有的关系；(2)经济关系，首先是与所有制相联系的关系；(3)全世界关系，即包括整个世界并构成一个体系的关系。

这也就是联系着两个体系的交往关系。

列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需要同俄国作生意”。当时他又补充道，“同时我们也说过，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作生意”⑦。

列宁的下述论断也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各国社会制度不同甚至对立，在相互的经济交换中双方都有利害关系，都想得到国际分工的益处，“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还是会给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的”⑧。可见，列宁不仅承认存在共同关系，即不论社会经济制度之不同而把所有国家联系起来的关系，而且还指出了它们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列宁在理论上的科学贡献不在于揭示全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而在于作出了在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体系的条件下，甚至在企图对新社会

制度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仍会保留这种关系的结论。从这里我们看到，列宁在创造性地运用和深入发展马克思关于交往关系的论断方面，为我们树立了鲜明的榜样。

国际舞台上的交往关系 在研究生产关系的结构时，马克思把交往关系摆在一定的地位上，现在，由于新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马克思的“六本书计划”才广为人知，马克思原来是打算用这些书来彻底揭开“资产阶级经济制度”^⑧的。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的经济基础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中原生的、基本的、再生的和派生的生产关系各占据一定的地位。例如，生产本身的关系，即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无疑是第一级的，分配关系是第二级的，而再分配关系则是第三级的等等。这是为经济基础各要素的客观作用建立等级的第一个标准，即生产的标准。但马克思将生产关系延用得更远——超出了具体共同体的界限。马克思的原话说：“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⑨。在这一论断中，非原生性和转移性两个概念的接近是特别重要的。在这里，生产关系的非原生性、派生性本身既可解释为它们通过国界的转移，也可以解释为远远地脱离本国的生产，以致这种转移、“转换”把它们“全部”变成交往关系。马克思本人在《引言》第四点的小标题中写道：“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⑩。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个人类以及人们具体历史共同体发展辩证法的一般概念论观点中可以得出结论：与生产关系相比，交往关系是为了开展经济活动：学会经济活动的经验、方法、知识，以及为了越过国界开展运用这些经验、方法、

知识的竞赛而进行的经常接触，因为在人类向经济生活和各方面生活全面国际化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国界使各国人民已疏远起来了。

国际交往的这个客观趋势恰恰随着各族人民接近社会主义的前景而逐渐加强。列宁写道：“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也表明了“…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②。

因此不能认为交往关系已经失去了阶级性。相反，在每个历史阶段，这些关系都反映着国际交往参与国代表的阶级利益。当代全世界的交往关系首先是各国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确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政府的国家，其余世界的阶级力量和社会力量也参与了这一斗争，而且不断注视着这两个社会极端的情况：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不断加深，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关键问题，而社会主义则在稳固的、有前途的基础上不断地表现出自己保证社会全面进步的能力。

但是，在阐明双方的阶级性在当代全世界经济交往的性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中是怎样表现之前，须要先研究一下不同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实质在与该生产方式相应的每种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中能够怎样表现并表现到何种程度。换言之，首先要研究的问题用通俗的形式可以表述为：国际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基础的实质，其相应范畴的内容是什么？问题看起来不那么“简单”！如果是这么简单，那就看不出它本身是怎么产生另一方面的大家十分注意的任务：测定国际经济关系有多大“权利”来衡量内部经济制度的效益。

内部经济制度在对外联系中的“代表性”和用对外联系

来“衡量”内部经济制度的效益，在每种生产方式，即在当今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生产方式中以及在他们“的结合部”上的体现是不同的，因此必须从彻底考察两种制度提出的国际经济交往类型开始。“统一物是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③，这就是列宁对认识社会的唯物辩证法基本法则的说明。

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 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就其包括的交往关系的范围来说是历史上第一种世界交往关系。它是通过自己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系，即15—18世纪的世界市场，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本身狭窄的手工业工场生产基础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并在需求的压力下于19世纪上半期建立了大工厂工业，而大工厂工业若离开世界销售则是不能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回忆一下马克思著名的论述：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结果^④。

在所谓自由竞争时代，世界市场成为主要舞台，而国际贸易，首先是殖民地贸易，则成为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基本工具，成为攫取、再分配和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日益增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杠杆，剩余价值包含在越过国界销售的商品当中。但正是这种势力，即在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条件下产生的生产和销售国际化，将世界贸易变成各国之间交往（剥削者掠夺）的主要工具，与财政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我增殖的”价值中确立统治形式的同时，则将商品交换和整个流通领域推到“次要地位”。这对“老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表现是商品输出，而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来说，资本的不断输出则成为典型的交往手段。简言之，这说明在19—20世纪的交替时期，以市场为主的世界交往体系向生产型世界经济体系即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过程发生了质变。除了这种由一些国家直接剥削另一些国家的体系而外，外部列强还对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居民强行财政扼制和殖民压迫。“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⑮。因此，列宁在研究过程中，把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剥削即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地区分开来。列宁认为，自己的主要研究任务恰恰在于阐明“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形…”^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概念的内容也适用于各种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个分系统（而不是阶级之间的直接分系统）。

如果垄断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原始生产关系的基础，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再生的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的网络，则是超级垄断组织（这是列宁对国际垄断联合公司的评语）对全体劳动者和基本居民中非垄断阶层即整个人民进行统治的体系。国际经济交往即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表现在垄断联盟和帝国主义国家同盟对资本所控制的世界进行经济和政治瓜分上。这种专权结构显得十分复杂，是由于在帝国主义竞争中心的周围形成了半附属国、附属国和完全从属国多级统治集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具体面貌，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同盟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动而变化的

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垄断联盟与另一个联盟之间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国际经济交往即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动力。这个规律赖以发挥作用的条件产生于，形成本国财政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途